



麦克米伦回忆录

1

风云变幻

商务印书馆

麦克米伦回忆录

<一>

风云变幻

1914—1939 年

〔英〕哈罗德·麦克米伦 著

山东大学外文系翻译组 译

山东师范学院外文系翻译组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 年·北京

Harold MacMillan
WINDS OF CHANGE
MacMillan and Co. Ltd. 1966

据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66 年版译出

麦克米伦回忆录

<一>

风云变幻

1914—1939 年

〔英〕哈罗德·麦克米伦 著

山东大学外文系翻译组 译

山东师范学院外文系翻译组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1¹/₂ 印张 516 千字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8,700⁰ 册

统一书号: 3017·345 定价: 2.65 元

编者的话

麦克米伦 (Harold MacMillan, 1894—) 是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1894 年 2 月 10 日生于伦敦。年轻时, 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919—1920 年任驻加拿大总督副官。1924 年当选保守党议员。1940—1942 年任军需供应部政务次官, 接着, 担任过一个很短时期的殖民部政务次官。从 1942 年至 1945 年大战结束, 担任英国驻西北非盟军总部驻节公使。之后, 他先后担任过空军大臣、住房和地方政府大臣、国防大臣、外交大臣以及财政大臣。1957 年 1 月, 他继艾登之后出任首相, 至 1963 年 10 月卸任。此外, 他在 1960 年还被选为牛津大学校长; 1979 年 10 月访问过中国。

麦克米伦退出政界后即着手写回忆录, 从执笔到最后一卷出版, 前后历时近十年。

《麦克米伦回忆录》共分六卷, 译成中文三百余万字。作者站在自己的立场, 记述了从童年时代起至卸任首相五十年间英国国内和世界许多大事, 其中包括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 以及第二次大战后东西方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史料。六卷的标题分别为: 第一卷《风云变幻》(1914—1939 年); 第二卷《战争风暴》(1939—1945 年); 第三卷《时来运转》(1945—1955 年); 第四卷《乘风破浪》(1956—1959 年); 第五卷《指明方向》(1959—1961 年); 第六卷《从政末期》(1961—1963 年)。

本书因字数很大, 组译、校订和编辑工作都费时较多; 又因各卷竣译时间参差不一, 所以各卷出书间隔既长, 也未能顺序出版。

而是先出了第五卷，再出第六卷，然后依次从后往前出，最后出第一卷。第五卷封面不统一，有待再版时再行统一。

本书第一卷由山东大学外文系翻译组译，参加者有鲁少平、江家鼎、连富英、关引光等同志；校者是山东师范学院外文系翻译组，参加者为刘衍书、沈保和、郭模曾等同志。

1983年9月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	30
第二章 家庭背景	48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60
第四章 插曲	110
第五章 训练时期	122
第六章 选入议会：最初印象和人物评论	152
第七章 二十年代的生活	186
第八章 1924 年至 1929 年的议会	205
第九章 重大危机：1929—1931 年	250
第十章 抢救灾难	289
第十一章 访问俄国	331
第十二章 重建	363
第十三章 决定命运的年代：1931—1935 年	387
第十四章 1935 年的大选	432
第十五章 疑虑和迷乱	443
第十六章 中间道路	488
第十七章 慕尼黑：绥靖的历史	520
第十八章 滑向战争	590
附录	616
一、《重建》概要	616
二、《就业规划》导言	625

三、《未来五年》第一部分概要：经济政策	627
四、《和平的代价》摘要	640
五、《防卫的经济方面》摘要	647
索引	653

序 言

我于1964年8月4日开始写这本书,这一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五十周年。这次可怕的冲突,把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曾经导致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中影响最深远的那一次革命的各种力量都调动起来了,而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便接着发生了第二次这样的冲突,其规模甚至更大,历时更为长久。我们离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过于近,因而尚无法领会其全部含义。然而,在这两次大动荡中,旧世界消亡了,一个新世界已经诞生。

五十年前,各欧洲大国仍然享有其大帝国的传统,抱着大帝国的希望。

至于我,还能回忆起我们这个帝国并以女王为其顶点的这个国家的极盛时代。那就是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六十周年的庆祝大典。虽然在幼儿园里经常念叨着女王,因而加强了对她的印象,但现在我对于她的记忆已经淡漠了,可是对于那一列列游行的军队我却仍然在脑海里留下了一幅清晰的图景,队伍由各族人民组成,穿着各式各样的制服,走在军队前头的是英国陆军里个子最高大的军官艾姆斯上尉。在1914年,这些形形色色的军队毫无疑问都是能够用来支持英国大国地位和利益的。

在这两次战争之间的年代里,人们也许已日益认识到一场不可避免的变革正要发生。然而我们还是怡然高唱着这个扩展自己版图的日不没帝国的赞歌。

今天,当那些主要的欧洲大国或已摆脱自己的责任,或已结合于一个较广泛较松散的联合体之中,这些迷梦便也烟消云散了。这

些观念在现代这一代人看来不是不可理解的，就是令人厌恶的。

2 同时，在全世界，另一次革命正在发生着，两次大战都对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我下笔写到这些话，听见头上飞往盖特威克机场的大喷气式客机的隆隆声，或是听见乡村公路上川流不息的小汽车的声音，代替了我儿童时代各种马拉车辆的得得声和丁当铃声时，我就会想到这一次革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引起的巨大变化已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1914年8月在整个欧洲熄灭的灯光已在幽暗的贫民窟内闪烁着，也在辉煌的会议厅里照耀着。今天，实用科学的光辉给最卑微的家庭也带来了使之普遍感到舒适与方便的照明，这在本世纪最初十年内还是梦想不到的。然而这些光辉也带来了新的可怕的恐惧，带来了灭绝人性的大规模残杀手段，使我们上一辈人感到惊惧而为之咋舌。

社会革命是近五十年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这方面技术虽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还不是唯一的动力。和十九世纪“迟者遭殃”的竞争哲学——极端个人主义大相径庭的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集体责任感，关心人类大家庭，在某些方面更类似中世纪理想的想法。当一个大主教可以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基督教异端”的时候，他正是揭示出我们离开那个时代已经多么遥远，那时满足于歌唱“有钱人住城堡，穷光蛋倚大门”，并心安理得地把安排各自财产的责任归之于上帝。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福利”国家的出现也许是近五十年发生的一切变化中最为明显的了，因为它对他们的生活具有那么密切的影响。但与这新增长着的集体主义同时存在而未被忘却的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个人主义比较美好的方面，个人决定的自由，首创精神以及责任感。的确，关于国内政治问题的争论，大都由于这两种哲学起着有成果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随着社会看法的这一改变，经济思想中也出现了一个新纪元。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自由党旧日的放任主义的学说衰

微了。大多数公正人士的头脑中已开始出现这样一种思想，即在国家与生产、分配、甚至交换有关的人士之间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³有效伙伴关系。对正统理论起反作用的极端形式——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连工党也未曾严肃地提出。然而在那些曾经深入钻研过他们党的历史并对该党的哲学潜心探讨过的托利党人看来，托利主义财政与经济的传统原则自从 1886 年以来就被辉格党和自由党的新党员削弱了。在自由党内，阿斯奎斯及其比较“温和的”追随者们是忠实于古典经济学说的；而且劳合·乔治在第一次大战前发挥出来的那种生气勃勃的力量，依然留下了它们的痕迹。随着三十年代国际局势的暗淡，以及重整军备变得必不可少，这类关于政府与工业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愈加尖锐，愈加紧迫了。

对英国来说，两次世界大战意味着往外倾泻它自己的财富到了这样一种规模，以致使它从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债权国，至少是短期间变成了一个经常负债、财政困难的债务国。自从我青年时期以来，没有什么东西比英国相对经济实力改变得更大的了。那时候，交换中的奥妙，收支差额，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储备规模，增长率都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普通人不得与闻。当时的政治论战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涉及过这些问题。甚至认真的报刊也很少提到它们，普通刊物更是把这些问题完全置之度外。大多数商人一生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他们出口自己的产品，不过为了利润而已，并非受到官方鼓励出口运动的推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公众已经讨论起货币问题来了。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里，这个问题曾经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中带着几乎是宗教般的热情进行过激烈辩论。这表明情况已和流行于 1914 年以前的年代里的气氛截然不同，那时候，商业界大致说来对于货币制度的功能是漠不关心的。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特别是由于恢复金本位后，英镑定价过高对英国产生了影响；

1929—1931年信贷结构发生总崩溃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又产生了影响，长期以来被认为属于学术范畴的那些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酷的现实了。当未加利用的资源是那样多，那样明显，人们开始对货币信用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表示怀疑，看来这种信用会使他们注定要遭受贫穷和失业。“捧着聚宝盆挨饿”已成了描述这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情况的一句流行的口头禅。^①

这一切仍然是活生生的问题。国家与工商业之间的适当关系如何，仍然是一个辩论中的问题。辩论有时是在理论上进行的，有时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的。为了改善信贷而建立的各种国际组织虽已取得巨大的成就，某些国家的困难虽已促使人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普遍衰退的重演，但我们大家都明白，问题并未得到最后解决。辩论在继续进行；计划仍在一个接一个地提出。虽然迄今世界已逃过了一场灾难——也许部分是由于人们普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要么发展要么死亡的缘故——然而我们还是过着尽往好处想的日子，而我们如果诚实的话，便不得不承认我们尚未找到真正的答案。信贷的基础与生产潜力仍旧不相称。风险仍然存在。

本书第一卷从一次战争叙述到另一次战争的爆发。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时期中有较长的一段时间看来是充满希望与信心的。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并不怀疑热情会产生知识，会引导我们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只是在最近几年内我们才好象希腊悲剧里所描写的那样不知不觉地卷入一场事先虽看到却无力预防或制止的大灾难。我于1924年被选入议会，除了当中两次短暂的间断外，到1964年议会解散时止，我一直是一名议员。因此，在本书

① 这句话在邓达斯(后来的梅尔维尔勋爵)1800年10月28日致斯潘塞勋爵的信件中出人意外地出现。他提到“人们由于人为的因素不得不捧着聚宝盆挨饿这一谬论”。

这个第一卷中将要描绘的极其重要的年代里，我得以列席下院观察事态的发展。虽然直到 1940 年丘吉尔组阁时为止，我从来不是任何一届政府的成员，但我认识了许多重要人物，多数大辩论也大都参与过。随后的几卷将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年代，直到 1963 年 10 月我辞去首相职务为止。

在这场伟大的戏剧场景中，我个人的卷入是以一个小人物开始，而以担负重任告终。虽然许多我曾对之负有责任的重大事件必须详加叙述，特别是在后面几卷中，但我无意将本书写成一本辩护状；作为出生于这次大变动之前，并作为在这个使人非常惶惑而又非常振奋的奇异新世界幸存下来的几个老年人中的一个，我倒有意叙述一下也许不仅仅会使我的同时代人——可惜他们之中很少有人现在还活在人间——感兴趣，而且会使经历过某几幕或某几场但未得窥其全貌的青年和中年男女也感兴趣的故事。

霍勒斯·沃波尔在他的一封信中对报道当代的困难发出怨言说：

生活于自己时代的恶果之一就是直到死时也还不了解自己时代的真相。

然而，观众确实看到了某些东西，而且是有关当前角逐的东西。丘吉尔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序言中这样写道：

同前面各卷一样，我尽力之所及，仿效了迪福的《一个骑士的回忆录》的撰写方法。在那本书中，作者以他个人的经历为线索，记述和议论了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事件。^①

这种方法对于一个并不希望成为历史学家，仅是致力于记录他自己时代较为低微工作的人同样是适合的。我主要的意图就是按照事情留给我的印象，或许说按照事情对我生活发生的影响而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伦敦，1948），第 7 页。

描述它们。同时，我还力图以“五十年的变迁”这一宏伟背景为衬托，把我这幅有限的图画描绘出来。

在我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岁月里，建立在海上实力之上的英帝国权威尚未遭到挑战——至少可以说，尚未被动摇。我们自己的父母和老师们都扎根于这样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内英国海军维持近一百年的世界和平；在这个世纪内，除了对于大国生活并无多大冲击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外，并没有发生过把英国卷入其中的欧洲战争；在这个世纪内，欧洲各国，尽管有着许多较小的和若干较大的困难，仍旧发挥其作用，维护住了和平，并使各国相互的力量，包括它们对殖民地的野心，在不引起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得到调整。这个世纪是这样一个时期，在这时期大多数明智的人士，不管是保守党人还是自由党人，都觉得在解决国内政治与社会问题方面正在取得令人满意的进步，而且觉得这种进步将继续下去，不至于发生严重的动乱。这个世纪是这样一个时代：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财富的生产，甚至其分配，都有了显著的增加，当然也出现过某些暂时的衰退。但这在当时，正和以后的情况一样，被认为是任何经济体系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紧接着拿破仑战争而出现的动荡和混乱消逝之后，国际金本位已成功地建立起来，而且保持下来。无论是过分的通货紧缩还是过分的通货膨胀都没有构成严重的威胁。经济萧条时期的失业现象虽然后果严重，但在经济发展时期都得到了正常的补救。无论如何，普遍的看法是，人类不可避免地要遭到一定程度的苦难，例如贫穷或疾病。社会良心的刺激对于好思考的人当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八十年代激进改革家约瑟夫·张伯伦的真正继承者劳合·乔治的有力影响之下，1905年的自由党政府使许多人觉得它有点刺耳地表达了这些感觉，而只有少数反动派认为这种情况是预示着革命。改革，甚至是看起来很激烈的改革，都从未动摇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信心。

一般说来,我们大多数在中学或大学里的青年都觉得,无论是在对外政策还是对内政策方面,世界将或多或少地如同以前一样地进展下去。如果我们是乐观主义者的话,我们就期望朝着人类更大的幸福持续前进。即使我们疑心更重一些,对德国沙文主义的种种事例或许日益感到惶惶不安,但我们当中没有哪一个人对于我们不久即将陷入其中的梦魇世界曾得到任何暗示。可是,一代人之后,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来说,竟然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还没有完全推翻也是大大动摇了欧洲和 7 欧洲国家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一种原来以地中海为基础的文明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向外传播,最后欧洲人的优势至少在欧洲人自己的心目中被认为是当然的事情,而且也为世界其余部分广泛接受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欧洲的影响有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给予古希腊的影响一样,不过规模较小而已。文明国家或自称具有较高的文明并借此统治着世界其余一大部分的那些国家,在一场剧烈而旷日持久的斗争中自相残杀,因而弄得四分五裂。协约国(同盟国如有条件的话无疑也会这样做的)有点糊里糊涂地征募了数达十余万的非洲人和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去观战。战争结束时,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的经济都遭到了部分的破坏,伤亡和残废达数百万人之多。一些古老的君主国被推翻了;人口众多、潜力巨大的俄国在社会秩序与结构方面经历了彻底的革命;奥地利遭到了肢解,没落下去;法国、意大利、比利时都蒙受重大损失,内部弱点立刻暴露出来。德国自己尽管免遭入侵的灾难,但在人力、财力和内部团结方面都遭到了损害。战争临近结束时,美国——至少暂时地——抛弃了曾经推行了好几代的孤立主义政策,参加了这次战争,给战争以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欧洲的优势,如果说尚未彻底完结的话,也似乎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从经济观点来看,欧洲由于巨大的通货膨胀和债台高筑,已处

于极为严重的境地；除非赖债，很少国家能够从这个罗网中解脱出来。旧的国际金融体系自动平衡似乎绝望地动摇了。许多人预言全部金融和经济权威的中心不久就要转移到美国去。

就不列颠海外帝国而言，殖民体系相对说来未受削弱。印度次大陆的庞大军队在支持英国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印度日益觉醒并逐渐走向自治。在发展之中，虽然有些内在的困难，但似乎还没有理由马上就惊慌起来。在著名的领导人管辖之下的几个大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都确立了充分的独立，其表征之一就是它们各自签署了和平条约。

在英国，“适于战斗，适于选举”的战时口号使历史上最激进的改革方案得到了通过。一种接近于普选的东西就这样产生了，这是一百多年前就非常强烈地提出过的要求，但经过三个法案都没有被采纳。一直到1928年，甚至要到1948年才完成，但在实际意义上，在第一次大战后议会民主取代了在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占支配地位的议会贵族政治或寡头政治时，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人们依然认为“战前”是“正常的”。政府各部门，伦敦商业区，商界以及工会的主要努力就是回复到走惯了的路上去。即使在纯政界，也是普遍主张稳健的。右翼倾向传统；左翼即使处在压力之下，也是倾向宪法的。大规模的长期失业，以及由此而招致的贫穷与困苦，由此而产生的辛酸与失望，在国内某些地区是存在的。关于俄国的事例大家谈论得已不少，而且同志式地交换了许多情报；但事实上不管是哪个社会阶层的英国人都不会有危险真正受俄国事例的诱惑。当时和现在一样，一般只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有共产党人。

因此，当人们几乎被他们重大的战争经历震撼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却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着。在英国，

的确如同在整个欧洲一样，战后最初几年并未将已经发生的事情全部揭示出来。从外表看来，一切大致如故。美国拒绝参加国际联盟，决定回复到孤立主义上去，使许多人感到满足，而不是惶恐。⁹虽然国联被这一行动严重削弱了，也许——我们要是知道的话就好了——由于这一行动注定了它要失败，但其工作却进行得颇有成效，给人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在我国，如同在许多国家一样，国联的积极支持者包括所有的党派，而且无疑包括所有党派中最明智的成员。战后年代的前半期整个欧洲确实曾经面临各种严重的困难，但却得到了显著的恢复，这部分是由于国联组织的努力，部分是由于国际贸易和货币的复兴，同时毫无疑问也是由于美国大规模贷款的结果。今天，这一事实往往被人忘却或忽视。我们考虑并谈论两次大战之间年代出现的那些可怕的情况；但是事实上，直到 1929 年大衰退时止，战后的头十年显示出旧世界具有显著的复兴能力，当然也显示出了新世界的繁荣景象。但是大灾难的来临只能推迟几年而已；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发生财政和商业的大衰退之后，接着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经济与财政一旦破产，许多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便拒付全部内债，从此欧洲就沿着走向毁灭的道路滑下去了。可是在英国和法国，许多人害怕俄国，仍然保持着早期所形成的认为共产主义具有侵略性的那种心情，因此对墨索里尼的上台，甚至对希特勒的胜利都不予重视。

从我初次进入下院的 1924 年到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的 1935 年，我和我最亲密的朋友们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的问题。在 1924 年至 1929 年的议会中，当失业尚未大规模出现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倒是穷苦的征候和经济的失调——有关人的方面。但是，随着经济萧条的日益严重，失业情况的恶化，我们也越来越关心促进某种根本的治疗办法了。我们对第一个问题进行研究，迪

斯雷利^①给了我们启发，他对青年人的魅力仍然是不可抗拒的；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很自然地是受了凯恩斯学说的鼓舞，这种学说当时已开始从经济学家的队伍中传布到对现实政策感兴趣的所有的人民当中去了。

- 10 后来，希特勒的上台以及纳粹和法西斯独裁的蛮横无礼，促使我日益转向对外事务，并使我更加赞同和接近丘吉尔，使我对自己的党的出任公职的领袖们相对地不信任了。1939年9月3日宣战后，丘吉尔和艾登参加了政府。但他们未能使它维持多少时候。1940年5月席卷欧洲的风暴全面来临时，张伯伦垮了台，让位给了丘吉尔。丘吉尔让我在他的内阁中担任一个级别较低的职务，我接受了。我十六年的普通议员身份便告结束。几年之后，一天，令人厌倦的工作快结束时，丘吉尔把我留住漫谈，主要内容是谴责希特勒的。我当时可能显得对此不感兴趣，并要去睡觉。“你怎么啦？”他问道，“你赞成希特勒吗？”“不，首相”，我回答道，“可是不管怎样，你和我都有要感谢他的地方。他使你当上了首相，而使我当了一名次官。地球上除了希特勒之外，没有什么力量能办到其中任何一件。”我当时以为他会勃然大怒的；但过了一会儿，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那种奇妙的微笑浮现在他脸上。“嗯”，他赞同地说，“这倒有些道理。”

自然，在那些战争年代里，我们大家不管地位高低，责任轻重，思想和精力都被可怕的斗争所占据：首先是为了生存；然后是为了胜利。日常的例行公事使我们完全忙于处理当前的工作，以至难于去探索那些正在出现的更重大的问题。然而，我称之为近五十年的伟大革命的某些重要特征已开始显露出来。在供应部，为了一个目标，我们不得不匆匆忙忙地把整个英国的生产组织起来。我是多么深切地希望，某些为把生产组织得更好，并使政府与工业之

^① 迪斯雷利(1804—1881年)；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译者